

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七輯第二期 2011年6月 頁121-154

愛的教育，鐵的紀律？

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

陳婉琪、徐崇倫

摘要

父母親教養如何影響子女的心理健康？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國中生樣本進行分析，本文再次印證既有之結論——父母關愛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帶來正面影響，而嚴厲教養帶來負面影響，並且進一步回答了幾個問題。首先，只要不採用嚴厲的教養，並提供子女適度監督，便可以輕微減少焦慮、憂鬱等負面心理症狀。其次，高度的關愛支持能夠稍微緩衝嚴厲教養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接著，針對家長性別發現，父親具有獨立於母親的影響力，其影響強度與母親不相上下。最後，區分子女性別後，原先的監督管教正效應僅出現在「父子」及「母女」的親子配對上。此結果指出，同性別家長對子女可能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父母監督管教有助於子女心理健康，但影響幅度仍遠小於父母提供的關愛與支持。

關鍵詞：心理健康、青少年、父母教養、監督管教、嚴厲教養

陳婉琪，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徐崇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

電子郵件為：wchen@mail.ntpu.edu.tw

投稿日期：2010年8月30日；修改日期：2011年4月28日；採用日期：2011年6月2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June, 2011, Vol. 57 No. 2 pp. 121-154

Warm Support vs. Iron Discipl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Wan-Chi Chen, Chung-Lun Hsu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is correlated with parenting behavior among 12,753 ninth-grader student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reconfirming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parental support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harsh parenting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as follows. First, as long as harsh parenting does not prevail, proper discipline and monitoring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Second, high parental support could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harsh parenting. Third, fathers' parenting effect differs from mothers', and both are equally important. Lastly,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parental monitoring on child's mental health mentioned above only occurs in father-son and mother-daughter pai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ame-sex parent may play

Wan-Chi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ng-Lun Hsu, Mast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wchen@mail.ntp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Aug. 30, 2010; Modified: Apr. 28, 2011; Accepted: June 2, 2011.

a more crucial role i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Moreover, although parental monitor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parental care and support remain the most crucial factors.

Keywords: mental health, adolescent, parenting, parental monitoring, harsh parenting

壹、前言

青少年時期乃由孩童轉變為成人的過渡階段，對一個人日後的整體樣貌，包括自我認同、價值觀形塑、習慣與行為、教育及工作成就或身心健康等發展結果來說，具有不可小覷的重要性。孩子們在這個尷尬階段中，年齡身分的自我定位上下浮動搖擺，一下子想要耍酷，一會兒又需要撒嬌，手腳往往不知往哪兒擺；偶爾出現心理上的緊張、焦慮、憂鬱等負面症狀，也不算太奇怪。不過，當青少年的負面心理症狀出現的頻率超過一個限度，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因為這些症狀，即便沒有連結至外顯的破壞、偏差行為，但至少對他（她）個人的成長發展來說，卻有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這也是為什麼青少年心理健康始終是發展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或青少年研究等學門、領域的重要研究課題。

家庭與學校是絕大多數青少年的主要生活範圍，因此，也是相關研究的兩大區塊；而家庭因素中，又以父母親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在研究父母教養方式的大量文獻當中，關於父母親給予的關愛、接納、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的正面影響，幾乎可說是無庸置疑的一致結論。然而，所謂教養，即是「教」與「養」；如果關心、照顧、支持比較接近扶「養」成人的意義，那麼，「教」對子女的意義與影響又是什麼呢？

有不少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將父母親的管教視為「控制」與「過度保護」，並指出它對子女心理健康會造成不良影響（鄭惠萍，2002；Parker, Tupling, & Brown, 1979; Rigby, Slee, & Martin, 2007）。然而，若仔細檢視這些文獻的研究設計會發現，其理論建構與推論邏輯似乎有待商榷。更具體地說，過度的干涉、控制或許並非最佳管教策略，但是，將父母的管教行為全數歸為「限制子女自由的行為」，並單一、簡化地假設其負面影響，似乎並不是理想的概念建構。相較之下，另有研究者指出，「權威—寬容」（authoritarian vs. permissive）、「保守—自由」（conservative vs. liberal）並不必然是「壞與好」或「負影響與正影響」的二元對立；同樣是權威，也可區分為較傾向正面作法的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以及比較負面的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Baumrind, 1966, 1996）。從實證結果來說，這批教養研究文獻大致指向在高度情感支持的前提之下，適度的監督與要

求對子女的整體發展結果來說，是最好的（Lamborn, Mounts, & Steinberg, 1991; Steinberg, Lamborn, Darling, Mounts, & Dornbusch, 1994）。

國外文獻的不一致，使我們想要深入了解父母親的監督管教所隱含的意義，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監督管教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究竟是什麼？對正值叛逆時期的青少年來說，管教是否因提高親子衝突的可能性，進而提高子女出現負面心理症狀的機會？抑或，只要選擇適當方式，監督管教應會具有穩定心性的正面影響？在區分正常監督管教與不當管教之後，父母親的情感關愛支持是否能夠具有緩衝效果，降低不當管教對子女心理健康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本文將分析臺灣的國中生調查資料，一方面以驗證既有研究之明確結論，來顯示資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將嘗試釐清以上數項疑問，進一步了解臺灣國中生心理健康與其家長教養方式之相關。除了前述提問之外，由於既有文獻已指出，與跨性別親子關係相較之下，同性別親子配對經常更為關係緊密（Field, Lang, Yando, & Bendell, 1995; Lasko, Field, Gonzalez, Harding, Yando, & Bendell, 1996）；因此，本文也將進一步探討，針對不同性別子女，父親與母親之影響力是否有所差異。本文分析結果不僅能夠針對臺灣父母親的教養行為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供更深入的了解，也可為最適教養策略提供一些實證基礎。

貳、文獻探討

一、父母給予的關愛與支持

在研究父母教養方式的大量文獻當中，父母給予的關愛與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的正面影響，可說已得到相當明確的結論。關於教養方式，不同的研究經常採用不同的測量方式，如為數不少的研究採用子女填寫的問卷，¹但也有人採用父

¹ 指由子女回答親子關係，以及父母平日的教養風格，譬如 Pedersen（1994）研究挪威青少年；Canetti、Bachar、Galili-Weisstub、De-Nour 與 Shalev（1997）研究以色列高中生；Rigby 等人（2007）研究澳洲青少年；Kim 與 Ge（2000）及 Greenberger 與 Chen（1996）研究美國亞裔青少年。

母針對自己教養方式的自我評估 (Hill & Bush, 2001)，抑或兩種資料來源同時採用 (高美英、吳齊殷、呂碧鴻, 1998)，另有少數研究則採用訪員親自觀察記錄的資料；² 有時，研究焦點與操作性定義因人而異，如有人將焦點放在父母親給予的支持、有人著重在父母對子女的需求所給予的回應 (McLeod & Shanahan, 1993)，且不同的研究者經常採用不同的用詞 (包括支持、關愛照顧、溫暖、接納等)；³ 然而，儘管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及概念的操作性定義存在著各種或大或小的差異，但父母關愛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得到的結論是穩定而一致的。

父母親給予的關愛與支持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正面的影響，可以減少其憂鬱、焦慮等負面心理症狀出現的機率。這項穩定的因果關係也被認為具有跨群體、跨文化、跨社會脈絡的有效性 (transcontextual validity) (Weisz, 1978)。Chiu、Li、Feldman 與 Rosenthal (1992) 比較了華人非移民 (香港) 與移民群體 (美國、澳洲) 發現，不論在哪種社會脈絡下，父母行為當中的關愛支持等面向，始終都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亦即，移民經驗並不會改變這種親子關係帶來的影響力。Greenberger 與 Chen (1996) 比較了亞裔美國人與白人，也得到跨族群的一致結果。臺灣國內研究中，魏琦芳 (2009) 也指出，「父母傾聽心事、父母接納」對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

除了關愛支持本身對心理健康的正面影響之外，有些研究則特別強調，情感支持對於某些具有負面影響的事件或教養行為，具有緩衝效果 (buffer effect)。舉例來說，當生活中發生某些會產生負面影響的事件時，來自父母親與朋友的情感支持可以明顯降低負面的心理症狀 (Ystgaard, Tambs, & Dalgard, 1999)。也有研究顯示，在情感支持程度較低的家庭裡，打小孩 (spanking) 與幼童行為

² 譬如 McLoyd 與 Smith (2002) 針對美國各族群幼童之研究。

³ Wight、Botticello 與 Aneshensel (2006) 將「青少年是否感覺受到 (父母) 關心」視為「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Windle 與 Miller-Tutzauer (1992) 所指的「父母親支持」則包含了「關心」、「接受朋友」、「感覺親密」、「傾聽意見」……等內涵。Canetti 等人 (1997) 與 Rigby 等人 (2007) 採用 care 這個詞，而 Lamborn 等人 (1991) 採用 acceptance 這個詞。Gerlsma、Emmelkamp 與 Arrindell (1990) 則指出，許多不同的研究與量表，雖採用了不同的名詞，例如：情感 (affection)、關愛照顧 (care)、溫暖 (warm)、接納 (acceptance)，但所指涉的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感支持面向。

問題的增加有相關；但在情感支持程度較高的情況下，打小孩則不會出現相似的負面影響；換句話說，情感支持與體罰之間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McLoyd & Smith, 2002）。

二、控制、監視？督導、管教？

（一）管教的負效應

相較於父母的關愛支持，另一個經常被討論到的重要面向，便是父母親對子女的管教。究竟什麼叫做適當的管教？什麼樣的教養能夠得到最佳效果？哪種管教風格能夠培養出最健康、自信又快樂的子女？口語常謂「教養」，如果「養」這個字，是指扶養長大，涵蓋較多「照顧、溫暖、關愛」等意涵，那麼對普天下父母親來說，相較於「養」，「教」的任務或許是加倍艱難的挑戰，因為除了完成它之外，執行任務之前，父母還得要做出最準確、恰當的判斷。有趣的是，當我們試圖去檢視相關研究的累積過程（譬如早期研究如何建構出相關概念，而後來的研究者們又是如何調整、修正這些概念架構），我們也可以看出，「如何恰當地評估『教』這件事」，確實是一件困難度頗高的事。

為了解親子關係如何影響到子女的身心狀態，早期心理學文獻發展出一項重要的親子關係測量工具——雙親教養態度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用來衡量不同父母的教養風格，以及其所形塑出來的親子關係（Parker et al., 1979）。創造及採用這項測量工具的研究者，大多將親子關係區分為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即是前一段已詳述的「關愛」面向（care——包括情感支持、溫暖、親密等意涵）；而第二個面向，有不少研究者以「控制」或「過度保護」（control / overprotection）等用詞來描述它，⁴而相關問項內容大致上指涉著「控制、占有、不願讓子女獨立」這樣的意涵。⁵

⁴ 最常用的 PBI 完整問卷包括了 25 題問項，其中，12 題屬關愛面向，13 題屬控制面向，每個題項之選項分為四個等級（相當同意、同意、不同意、相當不同意）（Park et al., 1979）；中文簡介亦可參見徐畢卿與鄭惠萍（2002）。

⁵ 此面向的問項包括了「讓我做我喜歡做的事情」、「試圖掌控我所做的任何事」、「喜歡讓我自己做決定」、「不希望我長大」、「侵犯我的隱私」、「像嬰兒般照料我」、「讓我決定自己的事情」、「試圖讓我依賴她／他」、「覺得我不能照顧自己」、「給

審視 PBI 問卷題項的用詞，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概念建構**認為父母親對子女的「管」，所隱含的是負面的看法，也不難猜出這個分類架構下的相關假設：父母的「控制」對子女心理健康有不良的影響。而在這個分類架構下，確實有不少研究證實這種負面影響。舉例來說，有些研究採用「**病例對照**」研究法，比較了出現負面心理症狀（焦慮或憂鬱）的青少年，以及一般健康青少年在父母教養 PBI 兩面向的分數，⁶結果發現有症狀的青少年的父母「關愛」分數較一般正常家庭為低，而父母的「控制」分數則偏高（Gerlsma et al., 1990; Pedersen, 1994）。而同樣採用 PBI 測量工具以及相同的分類架構，Canetti 等人（1997）研究以以色列高中生結果指出，父母親被歸類為高關愛與低控管的這一組青少年，出現憂鬱或其他精神病徵的機會最低；Rigby 等人（2007）針對澳洲青少年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論——「關愛」減少負面心理症狀，而「控制」則與負面心理症狀呈現正相關。至於臺灣國內研究，也有類似的作法與結論（鄭惠萍，2002）。

然而，這樣的分類架構足以充分掌握教養行為的重要面向嗎？父母親的管教真的只能以「控制」這個概念來理解，而具有負面影響嗎？檢視 PBI 的題項內容，我們會發現，除了關愛面向之外，父母的所有「管教」行為都被視為限制子女的自由，也因而被名之以「控制」；「限制自由」也經常與「妨礙獨立」劃上等號，被視為一種過度保護的行為，並被賦予負面意涵；換句話說，這樣的**概念建構**，似乎完全排除了「管教行為包含某些正面元素」的可能性。

（二）管教的正效應

Parker 等人（1979）所發展出來的 PBI 教養兩面向測量工具，將管教與控制劃上等號。相較之下，發展心理學家 Baumrind（1966, 1996）則拒絕「權威一寬容」（authoritarian vs. permissive）、「保守一自由」（conservative vs. liberal）、「以父母為中心—以子女為中心」（parent-centered vs. child-centered）這類的二元對立，進一步將權威區分成兩類：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與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而當前者指的是多數人印象裡的傳統權威（強調父母的

我自由」、「對我過度保護」……等。

⁶ 病例對照研究（case control study）是臨床心理學或醫學常用的研究方法，社會科學很少使用。

意旨與子女的服從，親子關係以父母為中心）時，「開明權威」指的是父母親在對子女設下限制的同時，也會對子女的需求做出反應，並與子女的溝通保持開放的態度。藉著釐清不同性質的父母權威，Baumrind（1966）一開始將教養風格區分為三類，⁷不過，隨即被其他研究者調整成兩面向的四分類架構（Maccoby & Martin, 1983），其中，第一個面向是父母對子女的回應（responsiveness），第二個面向是父母對子女的要求（demandingness）；按照情感回應與行為要求的程度高或低，可區分出四種不同類型的教養行為（見表 1）。

表 1 Baumrind 及其他學者所發展出來的教養四分類架構

	情感回應：高 (high responsiveness)	情感回應：低 (low responsiveness)
行為要求：高 (high demandingness)	開明權威 (authoritative)	專制權威 (authoritarian)
行為要求：低 (low demandingness)	包容放任 (indulgent)	淡漠忽視 (neglectful)

資料來源：出自 Baumrind (1996); Maccoby & Martin (1983).

基於這樣的分類架構，已累積了不少實證研究。大體來說，多數研究的結論指向「開明權威」為最適教養風格（optimal parenting）。最主要的理由是，綜觀各項子女發展結果（包括心理健康、問題行為、學業成績、適應力等），開明權威教養——也就是父母教養結合了高程度的溫暖（情感回應）與高程度的嚴格（行為要求）——之下，子女的整體發展結果最好（Lamborn et al., 1991; Steinberg et al., 1994）。而且這項結論跨越不同的族群、文化、國家，⁸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Aunola, Stattin, & Nurmi, 2000; Shucksmith, Hendry, & Glendinning, 1995; Steinberg, Mounts, Lamborn, & Dornbusch, 1991）。

上述文獻回顧簡述了兩條各自發展的研究支線。比較這兩種概念建構，首

⁷ 除了上述兩類權威之外，第三類指「寬容」（permissive）。

⁸ 國內也有研究者比較四類教養風格，指出開明權威教養下的國小孩童，其生活適應最佳（陳富美，2005）。

先，我們可以發現，第二種（奠基於 Baumrind 概念所發展出來的）的分類架構容許「父母管教行為」有各種可能性，⁹而非純然將之視為「控制與占有」，應比 Parker 等人所發展出來的 PBI 教養測量工具更為適當。其次，當第一種假設預測「父母控制」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負面影響時，卻有為數不少的研究，基於第二種概念架構（指教養四分類），得到「適當的父母權威與行為要求及限制」對子女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的結論。雖然，仍有些實證結果不完全支持「高行為要求」所帶來的正效應（Garcia & Gracia, 2009; Martinez & Garcia, 2008），但可以確定的是，要探討父母權威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不能不同時考慮父母所給予的關愛支持程度。¹⁰

順著「開明權威應為最適教養風格」這項結論所延伸出來的思考邏輯，有些研究者開始將適度的監督視為教養的重要元素之一。舉例來說，研究加州華裔移民家庭的 Kim 與 Ge（2000），雖未採用上述的四分類架構，但將父母監督管教（monitoring）納入考慮，並得到監督管教有助於子女心理健康的結論。父母監督也經常被視為有助於青少年各方面發展（包括行為、心理健康、學業成績）的重要因素（Jacobson & Crockett, 2000; Pettit, Laird, Dodge, Bates, & Criss, 2001）。臺灣的研究者將「缺乏監督」列入「不當管教」的範圍裡（吳齊殷，2000）；高美英等人（1998）的研究則具體指出，「缺乏監督」和青少年之憂鬱症狀有正向關係；¹¹魏琦芳（2009）的研究亦指出，「父母嚴格管教」對青少年日後的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張高賓、陳明哲與連廷嘉（2007）研究臺灣兒童憂鬱症狀的影響因素則發現，與開明權威相比，父母親採取放任或專制權威式的管教方式，其子女有較高的憂鬱指數，並由此推論放任的管教反而帶給兒童負面情緒。

（三）不當管教

即便我們承認父母的管教、監督行為中，存在著「正面作法」可供選擇，也

⁹ 譬如權威，有可能是考慮子女反應的行為要求與限制，較接近「監督」，也有可能是只考慮父母意旨的「控制」；放任，有可能是關愛加寬容，也有可能是完全不理會的淡漠。

¹⁰ 既有研究明確地顯示，（高要求高回應的）開明權威教養下的子女，其心理健康要比（低要求低回應的）淡漠忽視教養下的子女來得佳；換句話說，父母教養訴諸某種程度的權威究竟是好是壞，會受到關愛支持這個因素的影響。

¹¹ 但這項相關只在女生身上發現。

很難否認「負面作法」的眾多可能性。國外已有許多文獻指出，父母體罰 (corporal punishment) 的頻率與子女憂鬱等負面心理症狀有關 (Turner & Finkelhor, 1996; Turner & Muller, 2004)。至於國內的研究者則經常將「缺乏監督」、「不一致教養」、「嚴厲教養」及「非引導式教養」這四種狀況都視為某種「不當教養」，並指出青少年憂鬱傾向 (及偏差行為) 與父母不當教養有關 (吳齊殷, 2000; 高美英等, 1998)。而其中的「嚴厲教養」(harsh parenting)，由於牽涉體罰，屬於一種明顯易辨識的教養行為，又特別受到注意。多數文獻將專制性質較強、不重視說明解釋、不顧慮子女感受，以及涉及怒罵體罰的管教行為都歸類為「嚴厲教養」。¹² 不論是西方國家還是華人社會，都有研究指出，嚴厲教養對孩童帶來的不良影響，包括較差的情緒控制、攻擊行為等 (Chang, Schwartz, Dodge, & Chang, 2003; Hart, DeWolf, Wozniak, & Burts, 1992; Xu, Farver, & Zhang, 2009)；臺灣資料的研究亦顯示，嚴厲教養會增加青少年的憂鬱程度 (Wu, 2007)。

三、性別重要嗎？父母教養與親子配對

以上文獻大多將父母親的教養效果併在一起檢驗，較少研究將父母親的教養行為分別檢視，區分不同的親子配對來看影響效果的研究更少。某些嘗試將父親與母親之教養區分開來的研究，其所關切的重點在於「父親的角色」；更具體地說，研究者所關切的問題是：對多數家庭來說，當母親承擔了較多家務、花較多時間與子女互動時 (Hochschild, 1989)，父親這個角色對子女是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呢？Amato (1994) 檢驗青年與父母親之間的親子關係是否影響其快樂程度、生活滿意度，以及心理焦慮程度，發現父親對子女整體心理健康的影響，不僅獨立於母親的影響，且其強度是不相上下的。Videon (2005) 除了指出父子關係效應獨立於母親的影響 (指減少青少年的焦慮程度) 之外，其分析更進一步指出，父母效應對兒子、女兒的影響都差不多。不過，這兩份研究的預測變項都相當粗糙，僅以單一變項 (即子女的「自評親子關係」，例如：「你是否滿意你與父親之間的關係？」) 來檢驗父親效應及母親效應；除此之外，這兩份研究雖區分了

¹²換言之，有些國外文獻將「非引導式教養」也併入「嚴厲教養」此類別，例如：Xu 等人 (2009)。

家長的性別，但卻未區分子女性別；換句話說，其背後的假設是父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的影響是相同的。

然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有不少國外研究顯示，媽媽與女兒之間的親密程度較高，爸爸則與兒子較親密（Field et al., 1995; Lasko et al., 1996），也有研究進一步區分不同的層面，且其結果指出，不論從情感層面或是行為層面來看，父親與兒子之間的關係都比跟女兒還要緊密（Harris, Furstenberg, & Marmer, 1998）。有些心理學研究指出，女兒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如果屬於不安全依附型，則憂鬱程度會較高，但母親與兒子之間的關係卻沒有類似的影響（Margolese, Markiewicz, & Doyle, 2005）。另一份來自英國的研究探討心理健康的代間傳承，其結果雖然指出父母心理健康整體來說確實會影響到子女的心理健康，但同時也發現，兒子並不會受到母親憂鬱程度的影響（Powdthavee & Vignoles, 2008）。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假設不同性別的家長對不同性別的子女都有著相同的影響，似乎並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從既有文獻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來看，子女——尤其是正值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有可能在情感、心理層面更為重視與自己同性別的家長，也因此，同性別家長對孩子的影響力在某些方面很可能會比異性家長來得更大。換言之，當我們在檢驗父母親教養方式與子女心理健康間之相關時，進一步區分親子各自的性別並分別檢視不同的親子配對，乃必要之分析策略。

四、臺灣的青少年心理健康

以上文獻探討多數為國外研究結果，然而，臺灣與歐美國家之教育體制及社會脈絡有所不同。針對臺灣青少年的研究顯示，臺灣的教育體制與升學過程的確會對青少年有所影響，不論使用橫斷面資料或長期追蹤資料，研究結果均顯示學業成就愈高、自我教育抱負愈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愈差（楊孟麗，2005；魏琦芳，2009）。另有學者分析長期追蹤資料發現，相較於其他年級的時間點，國三與高三階段的青少年，其憂鬱、焦慮等負面心理症狀的指標特別高（Yi, Wu, Chang, & Chang, 2009）。從上述研究結論來看，在臺灣教育制度下，教育競爭的確成為關切青少年心理健康時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雖然臺灣的社會脈絡與西方國家有所差異，不過，如前所述，在父母親影響此一面向上，若對照國外文獻與國內所累積的研究成果，其結論在大方向上（尤

指父母關愛支持的正面影響及不當管教的負面影響）是相當一致的。譬如採用 PBI 雙親教養態度量表的研究，得到與國外類似的結論（鄭惠萍，2002）；徐畢卿、羅文偉與龍佛衛（1999）則透過檢視此量表在跨文化脈絡中的信度與效度，確定它在本國的適用性。關於不當管教、缺乏監督、嚴厲教養的負面影響，研究結論也與國外文獻差異不大（吳齊殷，2000；高美英等，1998；Wu, 2007）。除了父母親教養方式的相關研究之外，在青少年負面心理症狀的性別差異上，有關臺灣青少年的研究發現也與多數國外結論一致。¹³ 至於區分家長性別與子女性別的相關研究，這方面並不容易對照國內外差異，因為國外文獻已不算多，國內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五、提問

臺灣父母親的教養行為是否以及如何影響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呢？當我們試圖以臺灣的資料來探索相關問題時，事實上，上述文獻回顧已針對某些部分提供了相當清楚的答案，讓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預期假設，譬如父母關愛支持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以及嚴厲教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過，還是有一些部分，既有文獻所提供的結論並不十分明確且一致；譬如父母親的管教，有些研究者將之視為「控制」或「過度保護」，認為它妨礙子女心理健康，但有些則認為適度的監督管教、恩威並施，才是教養的最佳策略。監督管教究竟是否會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呢？監督管教的效果或嚴厲教養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又是否會因關愛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呢？父親的角色是否與母親同等重要呢？針對特定性別的子女，不同性別的家長又是否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以上四個問題，本文希望透過調查資料的分析，能夠針對臺灣父母親的教養行為以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供更深入的了解。

¹³ 國外文獻大多顯示，青少年階段的女性要比男性顯示更多的負面心理症狀，例如：焦慮、憂鬱等。這樣的性別差異在兒童時期並不存在，大約是在 13 歲之後才開始顯現（Galambos, Leadbeater, & Barker, 2004; 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 Jose & Brown, 2008）。有關臺灣青少年的數份研究，在性別差異上也有相當一致的發現（林耀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許崇憲，2008；Yi et al., 2009）。

參、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與變項說明

(一) 資料來源

本文採用的資料來自「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 中的第二波調查國中學生樣本。TEPS 是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和國科會共同資助，並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歐美研究所共同負責規劃與執行的一項全國性長期追蹤調查計畫，了解對象為臺灣的國高中學生。這項計畫的國中生調查部分，係從 2001 年開始針對當年為國中一年級的學生，並將調查對象延伸至學生家長、老師和學校，以問卷自填的方式，進行多次資料蒐集。在抽樣設計方面，TEPS 依照臺灣地區（含澎湖離島地區）的城鄉分布、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差異，以及國中、高中／高職、五專等學制做為分層的依據，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抽樣，兼顧臺灣地區城鄉分布的特點，讓所抽取的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本文採用的第二波國中生調查，調查時間為 2003 年，調查對象當時為國中三年級。合併學生資料與家長資料之後，樣本數為 13,062；刪除有缺失值的樣本¹⁴之後，正式分析所採用的樣本數為 12,548。

(二) 被預測變項

本文研究焦點為國中生的心理健康。第二波國中生調查的學生問卷包含一組題項，詢問學生近一、兩年內有無特定負面心理症狀。我們以因素分析的方式來簡化資料，尋找此組變項背後潛藏的因素結構與關係。¹⁵檢視研究資料此題組

¹⁴ 在此指被預測變項（負面心理症狀）及焦點預測變項（父母教養之三個變項）有缺失值的樣本。家庭背景變項如有缺失值，則未刪除，而將「未填答」歸為一個類別。

¹⁵ 一般來說，因素分析分為兩種形式，一為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即研究者在進行 EFA 之前，並未對於資料的因素結構有任何預期與立場，而藉由統計的數據與指標來研判因素的模式；另者為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Hayduk, 1987; Jöreskog, 1969），即當研究者在研究之初既已提出某種特定的結構關係的假設，例如：某一個概念的測量問卷是由數個不同子量表所組成，

各題項的次數分配後發現，大體來說，這些負面心理症狀的分布偏向「從來沒有」與「偶爾一兩次」之間，在考慮可能違反多變量常態假定的前提下，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法（principal factor method）¹⁶（Fabrigar, Wegener, MacCallum, & Strahan, 1999）。

經因素分析發現，「不想和別人交往」、「鬱卒」、「想要大叫、摔東西、吵架或打人」……等六個題項同屬焦慮或憂鬱的負面心理症狀（參見附表 1）。¹⁷ 本分析以因素分析後計算得出的潛在變項標準化分數，做為被預測變項——「負面心理症狀出現頻率」，分數愈高，心理健康愈差。

（三）預測變項

第二波國中生調查的學生問卷包含了許多與家長管教及照顧方式有關的題項，且內容十分詳細，¹⁸ 因此，得以讓我們將之區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父母親的「關愛支持」，包括父親或母親是否「認真聽你的想法，和你溝通」、「撥出時間幫助你，在你碰到挫折時」、「很能接納你」等三種題項（每種題項，父親與母親各占 1 題，因此總共 6 題），這些題項的意涵大致上與國內外文獻所經常檢視的關愛照顧（care）、接納（acceptance）、支持（support）等內涵是相當類似的；事實上，這些內涵即屬於 Baumrind 所強調的「回應」（responsiveness）這個概念。第二個面向為父母親的「監督管教」，包括父親或母親對子女是否「要

此時因素分析可以被用來確認資料的模式是否即為研究者所預期的形式。在技術層次來說，CFA 是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一種次模型（submodel）（Jöreskog & Sörbom, 1993），而且除了做為因素分析之用，並可與其他次模型整合（如路徑分析），成為完整的 SEM 分析。由於我們並未假定特定的因素結構，且本研究在後續的模型分析所使用的模型分析架構相當簡單，不須使用到 SEM 即可進行分析，因此，我們認為利用 EFA 進行資料簡化是相當適當的分析策略。

¹⁶ 主成分法並未假定須符合多變量常態。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此處主成分法指的是因素分析其中之一的因素萃取方法，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不同。詳細說明可參照 Jolliffe（2010）。

¹⁷ 若針對這六個題項的信度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s α 為 0.79。從附表 1 亦可見，個別題項與刪題後分量表之相關（item-rest correlation）都大於 0.4，支持此測量之效度之項 A 項。

¹⁸ 相較之下，第一波國中生調查有關父母親教養方式的題項則非常少。

求生活作息」、「要求言行舉止與服裝儀容」、「飲食健康習慣」……等六種題項，共 12 題；這組題項除了監督管教（monitoring）的意涵之外，與 Baumrind 所強調的「要求」（demandingness）這個概念亦相當接近。第三個面向則是父母親是否採取專制性質較強、不顧慮子女感受，或是涉及體罰的「嚴厲教養」，包括「不准你插嘴」、「動不動就大罵你」、「動不動就打你」……等四種題項，共 8 題（詳細題項說明及編碼，請參見附表 2）。

以上這三組題項，每題編碼皆為「是 = 1 分」及「否 = 0 分」，各組題項加總分數再經過標準化處理，成為三個教養變項。此外，為了解父親與母親的教養效應是否有所不同，在第二部分分析中，另外將父親與母親的教養題項區分開來，各自檢驗。不過，在此要特別注意的是，有關父母親的教養方式，本文所採用之測量乃根據子女的知覺感受，而非父母實際的教養方式或父母知覺感受的教養方式。此類測量有可能造成推論的限制，故將於文末做進一步的討論。

而除了父母親的教養方式之外，本分析亦納入家庭背景之基本資訊做為控制變項，包括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每月家戶收入、家庭結構（非完整家庭 = 1，包括喪父或母、父母離異或未同居；完整家庭 = 0）。這些家庭背景變項之基本資料，請參見附表 3。

二、分析方法

本文採用一般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多元迴歸來分析父母親的教養方式如何影響青少年子女之負面心理症狀出現頻率。分析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檢驗「關愛支持」、「監督管教」、「嚴厲教養」這三種教養變項之效應，但不區分父母親。除了主要效應（main effect）之外，同時也考慮了交互作用的可能性；亦即，關愛支持是否緩衝了嚴厲教養的負面影響？監督管教效應又是否因關愛支持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分析的第二部分則進一步將父親與母親的關愛或管教區分開來，同時也區分子女的性別，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夠比較：父親與母親是否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對不同性別子女之影響又有何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父母親的教養資訊之外，由於每個問項題組都包括了祖父母與其他家人，讓我們得以將父母親的影響力與其他家人做個比較。正式分析之前的初步分析結果顯示，當父母親以外的家人也採取相同教養方式時，其效應

遠比父母親的影響顯著小的多。¹⁹ 這樣的結果也為本文的研究焦點（指將研究重點放在「父母親」對子女心理健康之影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肆、分析結果

一、父母教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

表 2 呈現了焦點變項的描述統計。首先，被預測變項的原始加總分數平均值約為 6，如果平均分布至「不想與人交往」、「鬱卒」……等六種負面心理症狀，表示每位國中生平均來說，每種狀況都是「偶爾一、兩次」出現。接著，觀察比較父親與母親的教養差異，可以看到在「關愛支持」及「監督管教」上，母親的平均值都顯著高於父親，表示（情感）「回應」與（行為）「要求」這兩種教養關鍵面向，不論從哪一種來看，都是母親負擔了較多的教養責任。這與既有文獻針對華人社會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Shek, 2000）。至於「嚴厲教養」，父親與母親之間則無顯著差異。

表 3 呈現了多元迴歸的主要分析結果。其中，模型 M1 至 M3 只考慮教養變項，模型 M4 至 M6 則進一步將家庭背景因素納入做為控制；但我們發現，是否控制家庭背景因素並未影響到分析結果。主要結果簡述如下：

（一）在未考慮「嚴厲教養」時（模型 M1、M4），「監督管教」係數為正，且效應顯著（監督管教愈多，負面心理症狀出現頻率愈高）；但有趣的是，當分析納入「嚴厲教養」後（模型 M2、M5），「監督管教」之係數竟然由正轉負。這表示，模型 M1 與 M4 之所以得到管教負效應，是由於分析未能區分「適當管教」與「不當管教」；而一旦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嚴厲教養」被區分出來並控制之後，我們發現，父母親的監督管教確實能夠顯著減少國中生子女之焦慮、憂鬱等負面心理症狀。

¹⁹ 祖父母或其他家人對孩子的關愛支持之正影響，不及父母效應的六分之一；監督管教的影響，則約為三分之一。唯獨嚴厲教養的負面影響稍大，但也大約只有父母親效應的一半。

表 2 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 (N = 12,548)

變項 (min ~ max)	平均數 (標準差)
被預測變項 a	
國中生負面心理症狀 (因素分析後建構之潛在變項)	0.00 (0.86)
國中生負面心理症狀 (原始加總分數 0~18)	5.99 (3.79)
預測變項 a (以下顯示皆為原始加總分數)	
父母關愛支持 (0 ~ 6)	2.94 (1.90)
父母監督管教 (0 ~ 12)	5.83 (3.10)
父母嚴厲教養 (0 ~ 8)	1.81 (1.61)
(區分父親與母親教養：)	
父親關愛支持 (0 ~ 3)	1.17 (1.12)
母親關愛支持 (0 ~ 3)	1.76 (1.19) *
父親監督管教 (0 ~ 6)	2.45 (1.97)
母親監督管教 (0 ~ 6)	3.38 (1.94) *
父親嚴厲教養 (0 ~ 4)	0.89 (1.05)
母親嚴厲教養 (0 ~ 4)	0.91 (1.03)

註：1. a 正式迴歸分析中，被預測變項採用因素分析後建構之潛在變項，教養變項則採用分數加總後的標準化分數，以利比較。

2. * 表示在 95% 信心水準下，母親與父親之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二) 儘管父母的適當監督有助於子女心理健康，但與另外兩個教養變項相較之下，它的影響相當微弱 (模型 M2、M3、M5、M6)。影響最大的因素是「關愛支持」(減少負面心理症狀)，其次則是「嚴厲教養」(增加負面心理症狀)。這兩項結果，與國內外既有文獻之結論相當一致。

(三) 納入交互作用項之後 (模型 M3、M6)，我們發現，「監督管教」之影響並不因「關愛支持」的程度而有不同，但「嚴厲教養」與「關愛支持」之間確實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具體來說，當父母關愛支持的程度高於平均值時，能夠稍微緩衝「嚴厲教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²⁰ 確實也有國外相關文獻得到類似

²⁰ 然而，統計檢定顯示，即使關愛支持程度高於平均兩個標準差，嚴厲教養對子女心理健康仍然具有接近顯著的負面影響 ($t=1.94; p=0.053$)。

表 3 多元迴歸分析：父母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心理健康 a 的影響 (N=12,548)

預測變項	M1	M2	M3	M4	M5	M6
男生	-0.24*** (0.01)	-0.24*** (0.01)	-0.24*** (0.01)	-0.25*** (0.01)	-0.24*** (0.01)	-0.24*** (0.01)
父母關愛支持	-0.13*** (0.01)	-0.11*** (0.01)	-0.11*** (0.01)	-0.14*** (0.01)	-0.12*** (0.01)	-0.12*** (0.01)
父母監督管教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父母嚴厲教養		0.09*** (0.01)	0.08*** (0.01)		0.09*** (0.01)	0.08*** (0.01)
關愛支持 × 監督管教			-0.01 (0.01)			-0.01 (0.01)
關愛支持 × 嚴厲教養			-0.03*** (0.01)			-0.03** (0.01)
父親教育程度 b				V b	V	V
母親教育程度 b				V	V	V
家戶月收入 b				V	V	V
非完整家庭 b				V	V	V
Adjusted R ²	0.04	0.05	0.05	0.05	0.05	0.06

註：1.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2. a 被預測變項為負面心理症狀出現頻率。

3. b 父母親教育程度（五類）、家戶收入（六類）都以類別變項控制（缺失值自成一類）；非完整家庭為虛擬變項（1 = 喪父或母、父母離異或不處於婚姻狀態）。

V 字符號表示該變項已控制。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的結論 (McLoyd & Smith, 2002)。

(四) 值得順道一提的是，性別差異雖非本文之研究焦點，但性別變項的係數顯示，男生的負面心理症狀顯著低於女生。這項結果與目前國內外文獻的結論相當一致 (林耀盛等, 2006; Hyde et al., 2008; Jose & Brown, 2008; Yi et al., 2009)。²¹

²¹ 至於該如何解釋這樣的性別差異，Hyde 等人 (2008) 整合既有研究，指出「生理上的

為了更清楚地呈現兩個教養關鍵面向的影響，我們借用文獻回顧提及的教養四分類架構，以「關愛支持」及「監督管教」的測量分別反映「情感回應」與「行為要求」這兩個面向的程度高低，並計算出模型 M6 的迴歸預測值。從表 4 中我們可以看到，子女之負面心理症狀預測值最低的教養類別為高回應高要求的「開明權威」型父母，最高的類別則為低回應低要求的「淡漠忽視」型父母，與既有文獻結論相當一致。但「開明權威」與「包容放任」之間，以及「專制權威」與「淡漠忽視」之間，其差異則沒有那麼明顯（區間估計範圍相互重疊）；換句話說，真正關鍵的影響因素是父母親的情感關愛，是否監督管教對於孩子心理健康的影響相對來說小的多。²²

表 4 各類教養方式下青少年之負面心理症狀預測值 a（模型 M6）

	情感回應：高 (high responsiveness)	情感回應：低 (low responsiveness)
行為要求：高 (high demandingness)	-0.36 (-0.41 ~ -0.31) b (開明權威)	0.05 (-0.02 ~ 0.12) (專制權威)
行為要求：低 (low demandingness)	-0.25 (-0.32 ~ -0.18) (包容放任)	0.07 (0.0 ~ 0.13) (淡漠忽視)

註：1. a 預測值之計算方式：「高」=高於平均 1.5 個標準差，「低」=低於平均 1.5 個標準差；嚴厲教養設定為平均數；家庭背景控制變項設定為眾數之類別。

2. b 括號內為 95% 信賴區間。

性別差異」、「女性較傾向負面歸因」、「青春期帶來的身體變化」、「女性於實際生活中可能面臨較多負面事件」等幾項可能的解釋。

²²不過，從 R^2 來看，整體模型的解釋力仍屬偏低；換句話說，父母教養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解釋相當有限，同儕、學校生活很可能更為關鍵。事實上，既有研究已指出，家庭因素對臺灣青少年來說，在國中初期的影響最大，但隨著他／她進入以學校為生活重心的階段之後，學校因素的影響力會大於家庭因素（Yi et al., 2009）。不過，學校或同儕因素並非本文焦點，家庭因素仍應有被關注的必要性。

二、性別重要嗎？區分父母親以及子女性別之分析

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我們進一步將父親與母親的教養效應區分開來，同時也將全部樣本拆成男生與女生兩組個別分析。表 5 呈現了分析結果。首先，我們發現，不論是否區分子女性別，結果都顯示父親的教養具有獨立於母親教養的顯著效應：從係數來看，母親的關愛支持效應似乎比父親稍大，父親的嚴厲教養效應似乎比母親大，不過，統計檢定顯示父親與母親的影響強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²³ 這與國外既有文獻的結論是相似的（Amato, 1994; Videon, 2005）。接著，當我們檢視原本就不大的「監督管教」效應，發現一旦區分了父母親，效應便因減半而不再顯著（見全部樣本：模型 A2）。不過，很有趣的是，當區分了子女性別之後，對男生來說，只有父親的監督管教能夠顯著減少兒子的負面心理症狀，相較之下，母親的效應極低；類似地，對女生來說，只有母親的監督管教有助其心理健康，父親的影響力幾乎等於零。此外，若按照表 3 的作法，進一步考慮父母關愛支持與管教方式之間的交互作用，²⁴ 重做分析，仍會得到相同的結論。

基於 M2 及 F2 這兩個迴歸模型，我們進一步分別計算出男生與女生的負面心理症狀預測值（參見附表 4）。這些數值更清楚地呈現出，父親的關愛與監督程度較高者，對於降低國中男生出現負面心理症狀的影響幅度，要比母親來得大；反之，母親的關愛與監督程度較高者，對於降低國中女生出現負面心理症狀的影響幅度，要比父親的影響來得大。

²³ 全部樣本的分析中，父親與母親關愛支持效應差異檢定：F 值為 2.43 ($p=0.12$)，父親與母親嚴厲教養效應差異檢定：F 值為 2.86 ($p=0.09$)。區分子女性別的分析亦得到相同的結果。

²⁴ 若考慮交互作用，會有四個交互作用項，分別為「父親關愛支持 × 父親監督管教」、「父親關愛支持 × 父親嚴厲教養」、「母親關愛支持 × 母親監督管教」、「母親關愛支持 × 母親嚴厲教養」。因模型過於龐雜，此處並未呈現分析結果，可向作者索取。

表 5 國中生負面心理症狀的迴歸分析：比較父親與母親的影響

預測變項	全部樣本		男生		女生	
	A1	A2	M1	M2	F1	F2
男生	-0.24*** (0.02)	-0.24*** (0.02)	—	—	—	—
父親關愛支持	-0.06*** (0.01)	-0.06*** (0.01)	-0.04*** (0.01)	-0.05*** (0.01)	-0.08*** (0.01)	-0.08*** (0.01)
母親關愛支持	-0.08*** (0.01)	-0.09*** (0.01)	-0.08*** (0.01)	-0.08*** (0.01)	-0.09*** (0.01)	-0.09*** (0.01)
父親監督管教	-0.02 (0.01)	-0.02 (0.01)	-0.03* (0.01)	-0.03** (0.01)	0.00 (0.01)	0.00 (0.01)
母親監督管教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3* (0.01)	-0.03** (0.01)
父親嚴厲教養	0.06*** (0.01)	0.07*** (0.01)	0.08*** (0.01)	0.09*** (0.01)	0.04** (0.01)	0.04** (0.01)
母親嚴厲教養	0.04*** (0.01)	0.04*** (0.01)	0.04*** (0.01)	0.04*** (0.01)	0.04** (0.01)	0.04** (0.01)
父親教育程度 a		V a		V		V
母親教育程度 a		V		V		V
家戶月收入 a		V		V		V
非完整家庭 a		V		V		V
Adjusted R ²	0.05	0.06	0.03	0.04	0.04	0.04
樣本數	12,548	12,548	6,321	6,321	6,227	6,227

註：1.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2. a 父母親教育程度（五類）、家戶收入（六類）都以類別變項控制（缺失值自成一類）；非完整家庭為虛擬變項（1 = 喪父或母、父母離異或不處於婚姻狀態）。V 字符號表示該變項已控制。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伍、結論與討論

父母親的教養行為是否以及如何影響青少年子女的心理健康？透過「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國中生樣本的分析，本文不僅再次印證既有文獻的結論（指父母關愛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以及嚴厲教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更進一步地回答了幾個問題。首先，當有些研究者將父母對子女的干涉或管教視為「控制」或「過度保護」，認為它妨礙子女心理健康時，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只要不採用嚴厲教養的作法，父母對子女適度的監督管教，不僅不會妨礙其心理健康，甚至還可以小幅度地減少其焦慮、憂鬱等負面心理症狀（但其影響幅度仍遠小於父母所提供的關愛支持）。其次，監督管教的效果不因關愛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不過，高度的關愛支持倒是可以稍微緩衝嚴厲教養所帶來的不良影響。接著，針對家長性別，我們發現不論是在關愛支持的正影響，或是嚴厲教養的不良影響，父親不僅具有獨立於母親的影響力，且其影響強度與母親不相上下。最後，在區分子女性別之後，先前所發現的監督管教正效應，事實上，只發生在「父子」及「母女」這兩種親子配對身上。

進一步討論本文分析結果之前，在這裡有必要指出三點研究限制：

一、由於本研究關於父母親教養方式之測量乃根據子方的知覺感受，因此，在採用橫斷面資料以及一般迴歸分析的情況下，所得到的顯著相關未必可直接推論成我們所預期的因果關係。更具體地說，當分析結果呈現出父母關愛支持的顯著正係數時，除了「父母關愛讓子女心理愈健康」此可能之外，也相當可能是「心理愈健康的子女，對父母教養方式的感受也愈正向」，此乃最大的研究限制。不過，由於另一個或許更重要的焦點變項「父母監督管教」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比較沒有上述問題，²⁵ 再加上「父母關愛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之正向影響」已屬既

²⁵ 在此指比較沒有反向因果關係的問題。理由有二：一、相關問項內容屬於較具體的陳述，譬如：「爸媽會明確要求你的***」，因此較不受主觀知覺所影響；二、由於分析得到的結果是正向影響，我們很難說「心理健康愈好，愈容易認為爸媽會明確要求我的生活作息；而若心理健康愈差，愈傾向回答爸媽不會明確要求我的生活作息」。換言之，

有文獻中相當可靠的研究結論，因此，本文仍提供了某種程度的貢獻。

二、本文樣本來源為 2003 年的國三生，樣本代表性僅及於當年的國三學生，研究結果未必能推論至其他年級或其他年度的學生；尤其是跨年級的推論更應特別謹慎，因為國三對臺灣青少年來說，可能屬於特殊的階段。既有研究也已指出，在臺灣的教育體制下，受到升學競爭的影響，國三及高三階段青少年的負面心理症狀有明顯增加的現象（Yi et al., 2009）。換句話說，對其他階段（亦即心理健康平均來說較佳）的青少年來說，父母親的教養方式是否有相似的相關或影響，²⁶有待後續研究持續累積及驗證。

三、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模型分析架構相當簡單，亦未假定特定的因素結構，因此，分析方法並沒有採用較為複雜的結構方程式模型（亦見註腳 15 的說明），也因此，本研究之分析策略屬探索性。為了進一步釐清可能影響因素之間的明確關係，此處的初步發現當可為未來研究提供可能的方向。

本分析所呈現的結果，隱含了一些相當值得重視與討論的意義。其中，值得延伸討論的第一點是關於父母親的監督管教。由於父母關愛支持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幅度遠大於監督管教，因此，從這樣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父母親的「管」或「不管」，似乎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至少對子女心理健康來說是如此。在衡量管、不管或管多少的同時，真正必須考量的有兩個因素：一是讓子女感受到充分的關愛、接納與支持，才是最有助於心理健康的關鍵因素；如果一味地不在乎是否盡到監督管教之責，而本末倒置地忽略了真正的關鍵因素，即有可能會淪為「專制權威」，反而對子女造成不良的影響。二是管教的方法——當監督管教混雜了不當的作法（譬如不重視說明解釋，又牽涉怒罵責打的嚴厲教養），則即便多給予一些關心照顧，也不容易完全彌補不當教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²⁷

反向因果關係的可能性並不合常理。

²⁶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出此項研究限制。如同註 25 已提及，家庭因素對臺灣青少年來說，在國中初期的影響最大，而隨著他／她進入以學校為生活重心的階段之後，學校因素會比家庭因素來得重要（Yi et al., 2009）。這也表示，在國中初期，父母教養的影響有可能更為重要。

²⁷ Pong、Jamie 與 Chen（2010）的研究乃探討臺灣家長教養方式的最新文獻，其焦點並

除了父母關愛支持以及管教方式的重要性之外，值得注意的第二點則是與性別有關的研究發現。在關愛支持此面向上，不論是父親或母親，都具有各自獨立且重要的正面影響，且對兒子、女兒皆然；這一點與國外文獻的結論是一致的，也等於是為父親角色之重要性提供了實證基礎。不過，比較有趣的是監督管教這個面向的分析結果：為何在區分子女性別之後，原先發現的監督管教正效應，事實上只發生在「父子」及「母女」這兩種親子配對身上呢？

如同文獻回顧所提及的，有不少既有研究指出，與跨性別親子配對（父女、母子）相較之下，同性別的親子關係（亦即母女或父子）似乎更為緊密。正值快速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有可能在情感、心理層面更為重視與自己同性別的家長，也因此，同性別家長對孩子的影響力，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比異性家長來得更大。以本文研究焦點來說，當來自異性家長的關愛支持也顯示相當程度的正面影響時，他（她）的「監督管教」對女兒（兒子）來說，卻不及同性別的家長來得有助益，至少在心理健康層面上是如此。此結果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很可能是，在青少年發展自我認同、形塑自身樣貌（或俗話說的「轉大人」）的重要階段中，作為「角色模範」（role model），同性別的家長是更適合的人選；也因此，同性別家長若能採用合理適當的監督管教，有可能更能讓子女的心理上具有安全感（要特別重複強調的是，監督管教之「合理適當」應是此論證成立的重要前提）。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文採用資料之調查單位為個人（國中生），並非家戶。在 TEPS 資料庫中，每個家戶中有一位學生的資料，再加上至多兩位家長的資料，但不包含他／她的兄弟姊妹及這些手足與父母親的關係等詳細資訊；換句話說，本文分析結果至多能夠做的推論是，對某種性別來說，不同性別的家長對他／她的心理健康之影響力有所差異，但卻無法比較父親（或母親）對不同性別子女的影響是否有差異，也不能比較父子配對與母女配對之差異。不過，利用 TEPS 所提供的豐富資訊，本文結論當能為未來家庭研究提供可能的方向，進一步探究不

不在子女心理健康，而是在學業成就。雖然如此，這份研究類似地指出家長「專制權威」對子女學業的負影響，以及「開明權威」的正面影響。此結論可說與本文分析結果互相呼應——「管」本身並不必然是好或壞，但正確、有技巧的管教卻是影響子女福祉的關鍵因素。

同親子配對有何種差異以及如何解釋。對日益重視親子文化的現代社會來說，此類研究成果也應當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吳齊殷（2000）。家庭結構、教養實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臺灣社會學研究*，4，51-95。

【Wu, C.-Y. (2000). Family structur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adolescent behavior problems. *Th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 51-95.】

林耀盛、李仁宏、吳英璋（2006）。雙親教養態度、家庭功能與青少年憂鬱傾向關係探討。*臨床心理學刊*，3（1），35-45。

【Lin, Y.-S., Lee, J.-H., & Wu, Y.-C. (2006).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arental bonding, family function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rchive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1), 35-45.】

徐畢卿、羅文偉、龍佛衛（1999）。雙親教養態度量表中文版之信效度研究。*護理研究*，7（5），479-488。

【Hsu, P.-C., Lo, W.-C., & Lung, F.-W. (199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observable indicators of parental parenting attitude. *Nursing Research*, 7(5), 479-488.】

徐畢卿、鄭惠萍（2002）。雙親教養態度量表在精神衛生的應用。*臺灣醫學*，6（5），765-771。

【Hsu, P.-C., & Cheng, H.-P. (2002). The application of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in mental health. *Formosan Journal of Medicine*, 6(5), 765-771.】

高美英、吳齊殷、呂碧鴻（1998）。不當教養與青少年的憂鬱向度和問題行為。*中華民國家庭醫學雜誌*，8（1），11-21。

【Kao, M.-Y, Wu, C.-Y., & Lu, P.-H. (1998).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ept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dimension and conduct behaviors.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8(1), 11-21.】

陳富美（2005）。親職效能感、教養行為與孩子的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27（1），47-64。

【Chen, F.-M. (2005). Parental efficacy,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7(1), 47-64.】

許崇憲（2008）。大學新生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的性別差異。《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3，45-80。

【Hsu, C.-S.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factors affecting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freshme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3, 45-80.】

張高賓、陳明哲、連廷嘉（2007）。臺灣地區兒童憂鬱流行率之調查研究。《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8（1），27-92。

【Chang, G.-P., Chen, M.-J., & Lien, T.-C. (2007). A survey study of the prevalence of child depression in Taiwan. *NTTU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8(1), 27-92.】

楊孟麗（2005）。教育成就的價值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8（2），75-99。

【Yang, M.-L. (2005). The valu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8(2), 75-99.】

鄭惠萍（2002）。雙親教養態度、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生活事件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Cheng, H.-P. (2002).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al bondin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魏琦芳（2009）。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貫時性研究。《醫護科技學刊》，10（4），251-266。

【Wei, C.-F. (2009). Influences of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 longitudinal study. *The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s*, 10(4), 251-266.】

Amato, P. R. (1994). Father-child relations, mother-child relations, and offspr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4), 1031-1042.

Aunola, K., Stattin, H., & Nurmi, J. (2000).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s' achievem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3, 205-222.

Baumrind, D. (1966). Effects of authoritative parental control on child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37(4), 887-907.

Baumrind, D. (1996). The discipline controversy revisited. *Family Relations*, 45, 405-414.

Chang, L., Schwartz, D., Dodge, K. A., & Chang, C. M. (2003). Harsh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7(4), 598-606.

Canetti, L., Bachar, E., Galili-Weisstub, E., De-Nour, A. K., & Shalev, A. Y. (1997). Parental

- bonding and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ce. *Adolescence*, 32, 381-394.
- Chiu, M., Li, S., Feldman, S., & Rosenthal, D. A. (1992). The influence of immigration on parental behavior and adolescents distress in Chinese families residing in two western nation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 205-239.
- Fabrigar, L. R., Wegener, D. T., MacCallum, R. C., & Strahan, E. J. (1999). Evaluating the use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Methods*, 4(3), 272-299.
- Field, T., Lang, C., Yando, R., & Bendell, D. (1995). Adolescents' intimacy with parents and friends. *Adolescence*, 30(117), 133-140.
- Garcia, F., & Gracia, E. (2009). Is always authoritative the optimum parenting style? Evidence from Spanish families. *Adolescence*, 44(173), 101-131.
- Galambos, N. L., Leadbeater, B. J., & Barker, E. T. (2004). Gender differences in and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 4-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1), 16-25.
- Gerlsma, C. P., Emmelkamp, M. G., & Arrindell, W. A. (1990). Anxiety, depression of early parenting: A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0, 251-277.
- Greenberger, E., & Chen, C. (1996). Perceived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depressed mood in early and late adolescence: A comparison of European and Asian America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4), 707-716.
- Harris, K. M., Furstenberg, F. F., & Marmar, J. K. (1998). Paternal involvement with adolescents in intact families: The influence of fathers over the life course. *Demography*, 35(2), 201-216.
- Hart, C. H., DeWolf, D. M., Wozniak, P., & Burts, D. C. (1992). Maternal and paternal disciplinary styles: Relations with preschoolers' playgrou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and peer status. *Child Development*, 63(4), 879-892.
- Hayduk, L. A. (1987).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LISREL*.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ill, N. E., & Bush, K. R. (2001).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ing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mother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4), 954-966.
-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 Hyde, J. S., Mezulis, A. H., & Abramson, L. Y. (2008). The ABCs of depression: Integrating affective, biological, and cognitive models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5*, 291-313.
- Jacobson, K. C., & Crockett, L. J. (2000).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0*(1), 65-97.
- Jolliffe, I. T. (2010).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Springer.
- Jöreskog, K. G. (1969). A general approach to confirmatory maximum likelihood factor analysis. *Psychometrika, 34*(2), 183-202.
- Jöreskog, K. G., & Sörbom, D. (1993). *LISREL 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 Chicago: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 Jose, P. E., & Brown, I. (2008). When does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rumination begin?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rumination b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7*(2), 180-192.
- Kim, S. Y., & Ge, X. J. (2000).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3), 420-435.
- Lamborn, S. D., Mounts, N. S., & Steinberg, L. (1991).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62*, 1049-1065.
- Lasko, D. S., Field, T. M., Gonzalez, K. P., Harding, J., Yando, R., & Bendell, D. (1996). Adolescent depressed mood and parental unhappiness. *Adolescence, 31*(121), 49-57.
- Maccoby, E. E., & Martin, J.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E. M. Hetherington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4th ed.) (pp. 1-101).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Margolese, S. K., Markiewicz, D., & Doyle, A. B. (2005). Attachment to parents, best friend, and romantic partner: Predicting different pathways to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4*(6), 637-650.
- Martinez, I., & Garcia, J. F. (2008).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and self-esteem among Brazilian teenagers from authoritative, indulgent, authoritarian, and neglectful homes. *Adolescence, 43*(169), 13-29.
- McLeod, J. D., & Shanahan, M. J. (1993). Poverty,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3), 351-366.
- McLoyd, V. C., & Smith, J. (2002). Physical discipline and behavior problems in African

- American, European American, and Hispanic children: Emotion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1), 40-53.
- Parker, G., Tupling, H., & Brown, L. B. (1979). A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50, 1-10.
- Pedersen, W. (1994). Parental relations, mental health, and delinquency in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9(116), 975-990.
- Pettit, G. S., Laird, R. D., Dodge, K. A., Bates, J. E., & Criss, M. M. (2001). Antecedents and behavior-problem outcome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2(2), 583-98.
- Pong, S. L., Jamie, J., & Chen, V. (2010).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Asian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 Insights from the US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4(1), 62-72.
- Powdthavee, N., & Vignoles, A. (2008). Mental health of paren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 A within-family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8(3), 397-422.
- Rigby, K., Slee, P. T., & Martin, G. (2007). Implications of inadequate parental bonding and peer victimization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0 (5), 801-812.
- Shek, D. T. L. (2000).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treat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teenage childre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5(137), 135-146.
- Shucksmith, J., Hendry, L. B., & Glendinning, A. (1995). Models of parenting: implication for adolescent well-being within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contex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8, 253-270.
- Steinberg, L., Mounts, N. S., Lamborn, S. D., & Dornbusch, S. M. (1991).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nd adolescence adjustment across varied ecological nich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1), 19-36.
- Steingberg, L., Lamborn, S. D., Darling, N., Mounts, N. S., & Dornbusch, S. M. (1994). Over-time changes in adjustment and competence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65, 754-770.
- Turner, H. A., & Finkelhor, D. (1996). Corporal punishment as a stressor among you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1), 155-66.
- Turner, H. A., & Muller, P. (2004).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 corporal punishment on depressive

- symptoms in young adults: Potential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6), 761-82.
- Videon, T. M. (2005).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o dads matter?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6(1), 55-78.
- Weisz, J. (1978). Transcontextual validity in developmental research. *Child Development*, 49, 1-12.
- Wight, R. G., Botticello, A. L., & Aneshensel, C. S. (2006). Socioeconomic context,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5(1), 115-126.
- Windle, M., & Miller-Tutzauer, C. (1992).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family measure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4(4), 777-787.
- Wu, C. I. (2007). The interlocking trajectories between nega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Current Sociology*, 55(4), 579-597.
- Xu, Y. Y., Farver, J. M., & Zhang, Z. X. (2009). Temperament, harsh and indulgent parenting, and Chinese children's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80(1), 244-258.
- Yi, C. C., Wu, C. I., Chang, Y. H., CHang, M.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aiwanese youth: School versus family context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4, 397-429.
- Ystgaard, M., Tambs, K., & Dalgard, O. S. (1999). Life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late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4(1), 12-19.

附錄

附表 1 青少年之負面心理症狀出現頻率（被預測變項）

負面心理症狀出現頻率 a	該題項與總量表之相關 b	該題項與刪題分量表之相關 b	刪題後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不想和別人交往	0.63	0.47	0.79
鬱卒	0.78	0.66	0.75
想要大叫、摔東西、吵架或打人	0.72	0.57	0.77
覺得搖晃、緊張或精神不能集中	0.72	0.58	0.77
感到孤單	0.75	0.61	0.76
睡不著、睡不好、很容易醒或作惡夢	0.65	0.48	0.79

註：1. a 原始題項為「國中二年級以來，曾有下列情形（0～3分：從來沒有、偶爾一兩次、有時有、經常有）」。

2. b 該題項與總量表之相關指 item-test correlation；該題項與刪題分量表之相關指 item-rest correlation。

附表 2 預測變項（父母教養）之變項建構內容說明

父母關愛支持（care / acceptance / support）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認真聽你的想法、和你溝通？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認真聽你的想法、和你溝通？

上國中以來，碰到重大問題或挫折時，爸爸會特別撥出時間來幫助你？

上國中以來，碰到重大問題或挫折時，媽媽會特別撥出時間來幫助你？

上國中以來，爸爸很能接納你？

上國中以來，媽媽很能接納你？

父母監督管教（monitoring）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明確要求你生活作息？（1 = 是；0 = 否）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明確要求你生活作息？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嚴格管教你的功課？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嚴格管教你的功課？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明確要求你的言行舉止與服裝儀容？

附表 2 預測變項（父母教養）之變項建構內容說明（續）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明確要求你的言行舉止與服裝儀容？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明確要求你飲食或健康習慣？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明確要求你飲食或健康習慣？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嚴格管教你交朋友的事？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嚴格管教你交朋友的事？

上國中以來，爸爸對你的管教頗為嚴格？

上國中以來，媽媽對你的管教頗為嚴格？

父母嚴厲教養（harsh parenting）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在管教你的時候，不准你插嘴或回嘴？（1 = 是；0 = 否）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在管教你的時候，不准你插嘴或回嘴？

上國中以來，爸爸會一叫你做事，就得馬上做，也不管你正在忙什麼？

上國中以來，媽媽會一叫你做事，就得馬上做，也不管你正在忙什麼？

上國中以來，爸爸動不動就大罵你？

上國中以來，媽媽動不動就大罵你？

上國中以來，爸爸動不動就動手打你？

上國中以來，媽媽動不動就動手打你？

附表 3 樣本之家庭背景基本資料（N = 12,548）

基本家庭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父親教育程度		
國中（或以下）	4,090	32.6
高中（職）	4,428	35.3
專科	1,811	14.4
大學	1,037	8.3
研究所	360	2.9
未填答	822	6.6
母親教育程度		
國中（或以下）	4,488	35.8
高中（職）	5,163	41.2
專科	1,312	10.5

附表 3 樣本之家庭背景基本資料 (N = 12,548) (續)

基本家庭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
大學	740	5.9
研究所	137	1.1
未填答	708	5.6
每月家戶收入		
2 萬元以下	1,732	13.8
2 萬~ 5 萬元	5,254	41.9
5 萬~ 10 萬元	3,793	30.2
10 萬~ 15 萬元	1,020	8.1
15 萬~ 20 萬元	319	2.5
20 萬元以上	311	2.5
未填答	119	1.0
家庭結構		
完整家庭	10,720	85.4
非完整家庭	1,828	14.6

附表 4 負面心理症狀預測值：父母親教養對不同性別國中生的影響 a

	男生 b	女生 b
父親：關愛支持程度低 監督管教程度低	-0.0 [-0.07 ~ -0.07]	0.25 [0.18 ~ 0.31]
父親：關愛支持程度高 監督管教程度高	-0.27 [-0.33 ~ 0.21]c	0.01 [-0.05 ~ 0.08]
母親：關愛支持程度低 監督管教程度低	-0.04 [-0.11 ~ 0.03]	0.31 [0.25 ~ 0.38]
母親：關愛支持程度高 監督管教程度高	-0.24 [-0.30 ~ -0.17]	-0.05 [-0.11 ~ 0.01]

註：1. a 預測值之計算方式：(關愛或監督管教程度)「高」=高於平均 1.5 個標準差，「低」=低於平均 1.5 個標準差；嚴厲教養設定為平均數；家庭背景控制變項設定為眾數之類別。

2. b 男生之預測值以表五模型 M2 來估計，女生則以表五模型 F2 估計。

3. c 括號內為 95% 信賴區間。